

古文字研究

朱德熙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古文字研究

第十二辑

中华书局

古文字研究

(第十二輯)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膠印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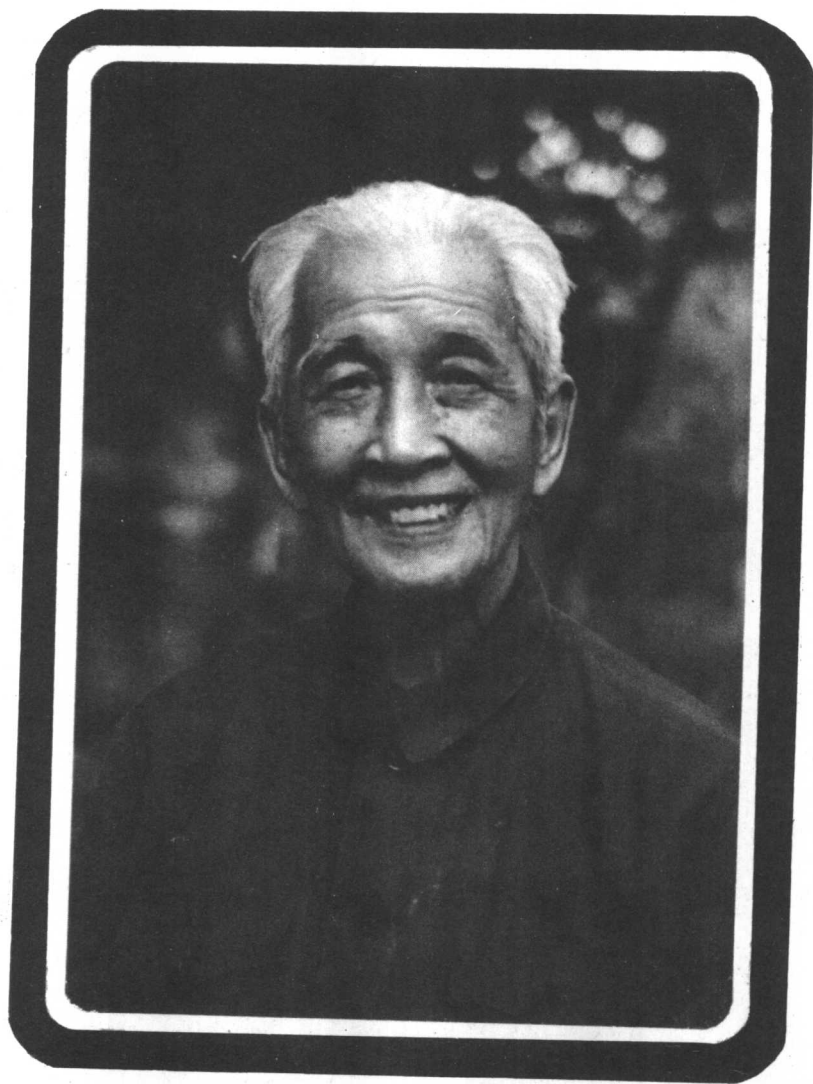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1/16·29 1/4 印張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600冊

統一書號: 9018·197 定價: 8.50 元

01010456699+ 郑州大学图书馆



容庚先生之遺像

出版說明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容庚先生於今年三月六日不幸逝世了。

先是，去年中山大學黨委準備在今年先生九十壽辰時舉行祝壽活動，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亦擬出版《古文字研究》專輯為先生頌壽。不意在專輯編輯過程中，先生遽歸道山，不克睹此勝舉。噩耗傳來，我們感到異常悲痛。謹將原來徵集的文章，編成此輯，前附以有關追悼會的報導及悼詞等，一並付刊。先生一生高風亮節，造詣深湛，世所景仰，謹以此輯獻給先生，用來寄託我們的哀思和懷念。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錄

容庚先生遺像

容庚先生悼詞（黃煥秋）

容庚先生追悼會於三月十六日在廣州舉行

赤誠愛國，嚴謹治學（歐初）

我與容希白（商承祚）

頌齋教授九十壽序（陳邦懷）

僚戈歌——獻給容老九秩榮慶（張頌）

希白先生九十壽詩（史樹青）

容庚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馮國權 孫稚雛）

希白師治學道路初探（張振林）

釋因蘊（張政娘）

釋殷虛甲骨文的「遠」「猷」（邇）及有關諸字（裘錫圭）

諸帚探索（趙誠）

讀《小屯南地甲骨》劄記（姚孝遂）

「侯屯」卜骨考略（陳煒湛）

商殷時期古黃國初探（齊文心）

卜辭中「虛詞」之性格——以由興隹之用例為中心（日·伊藤道治）

釋古文字中的翳字和二冊、弜冊、豆冊（于省吾）

一六七

說瑞（馬承源）

一七三

豐豐辨（林 雲）

一八一

釋貯辨疑二則（劉宗漢）

一八七

記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我國殷周銅器（王世民）

一九五

西周武成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劉啟益）

二〇七

邵簠編鐘的重新研究（劉 雨）

二五七

宋代所見商周金文著錄表（張亞初）

二六七

婦好墓銅器玉器所見氏姓方國小考（饒宗頤）

二九九

記述幾篇偽作的邦公華鐘銘文（澳·張光祿）

三〇九

蔡侯歸考（王人聰）

三二二

釋析（朱德熙）

三七

湖南戰國兵器銘文選釋（李學勤）

三三九

新出戰國金銀器銘文研究（三題）（黃盛璋）

三三七

盱眙銅壺銘識（李家浩）

三五五

楚繪書研究（高明）

三六三

《詛楚文》補釋（陳世輝）

三九七

上古漢語序數詞組結合方式的歷史演變（管燮初）

四〇七

《觀堂書札》考訂（曾憲通）

四一九

《國語》「武王伐殷」天象辨偽（美·倪德衛）

四四五

容庚先生悼詞

黃煥秋

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中山大學教授、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容庚同志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上午十時十六分在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逝世，終年九十歲。

今天，我們懷着極其沉痛的心情，隆重舉行追悼大會，我代表中山大學黨委和全校師生員工對容庚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並向容庚教授的夫人和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

容庚教授是廣東省東莞縣人。一八九四年農曆八月生，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莞中學，他在少年時期就喜愛收集、摹寫古文字，曾學習篆刻、繪畫。一九二一年任東莞中學教員。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一九二六年畢業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任講師、襄教授、教授，兼任過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燕京大學學報主編。一九四六年秋到嶺南大學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容庚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和書法篆刻家。近年來被推選為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廣東省書法篆刻研究會主任、廣東省語文學會理事。他治學嚴謹，孜孜不倦，畢生為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和發揚光大而認真工作。他對古銅器、古文字、書法篆刻等的研究，都有很高的造詣，尤其是金文和青銅器的研究在國內外居重要地位，素負盛譽。六十餘年來，他編撰了二十七部專著，發表了五十多篇學術論文，總計在八百萬字以上。其中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等，以其材料掌握的豐富和考證工夫的精慎，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推崇。他樂於和同道切磋學術，以期共同提高。一九二九年八月，他便開始與大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的郭沫若同志通信，提供新資料，探討新問題。容庚教授長期在大學任教，為我

容庚先生悼詞

二

國培養了許多古文字學和考古學方面的專門人才，有些早已成爲海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有關單位的業務骨干。容庚教授爲我國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容庚教授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前夕，他曾大聲疾呼，號召同行努力收集和保護文物，以免外流；同時著書立說，以自己確切不移的見解，糾正國外學者一些浮光掠影的學說。抗戰初，他曾任燕京大學教職員工抗日委員會主席，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十大教授募捐，集資創辦白話文宣傳刊物，在學生中很有影響。抗戰勝利後，他因發表一篇「萬言書」，抨擊國民黨政策，曾一度未獲聘職。解放以後，容庚教授與我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一九五六年，他毅然受組織重托，去香港工作，態度穩重，立場明確，完成任務很出色；歸來後，提出過入黨申請。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他在給香港親戚的通信中，深切地贊揚我黨的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在省委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發言，對社會主義前途滿懷信心，希望個人能爲黨、爲祖國多做工作，並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十年動亂期間，他身處逆境，備受迫害，依然剛直不阿，不講違心之話，不作背理之事；依然一心放在專業著述上，不斷地修改和補充自己的論著，以期在有生餘年，繼續作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系列方針、政策不斷得到落實，心情格外舒暢。他不顧老耄，繼續招收研究生，接受教育部委托舉辦古文字進修班，積極爲國家培養文化事業的接班人。五十年代後，一九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他分批將珍藏商周青銅器以及字畫、法帖轉讓或捐贈給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一九八〇年又將多年收藏的大批圖書獻給中山大學圖書館。這種爲社會主義祖國忘我獻身的崇高精神，值得我們的科學、教育工作者欽佩和學習。

容庚教授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和教育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我們悼念他，要化悲痛爲力量，更加緊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在黨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爲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爲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安息吧，容庚教授！

容庚先生追悼會 於三月十六日在廣州舉行

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中山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容庚先生的追悼會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廣州殯儀館隆重舉行。會場莊嚴肅穆，正中懸挂著容庚先生的遺像，下面放著他的夫人袁凌霄女士及兒孫們敬獻的花圈。兩側放著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廣東省人民政府、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廣東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辦公室、中山大學以及容庚先生的母校東莞中學敬送的花圈。

追悼會由廣東省政協主席尹林平主持，中山大學校長黃煥秋致悼詞。悼詞首先介紹了容庚先生的生平 and 學術貢獻。容庚先生是廣東省東莞縣人，生於一八九四年農曆八月，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畢業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任教。兼任過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燕京大學學報主編。一九四六年任嶺南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悼詞說：容庚先生治學嚴謹，在古文字、考古學以及篆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詣，著述甚豐，先後發表了專著二十七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其中《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二書尤為海內外學術界所推崇。在長期的教學活動中，他卓有成效地培養了許多古文字學和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為祖國的文化科學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黃煥秋高度贊揚了容庚先生的愛國主義精神。他說抗戰初期容庚先生出任燕京大學教職員工抗日委員會主席，發動募捐，創辦刊物，積極宣傳抗日救國道理。抗戰勝利後，又發表長文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全國解放後容庚先生熱愛新中國、擁護社會主義，與我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他滿腔熱情地將

自己珍藏多年的百餘件商周青銅器等古代文物捐獻給國家。十年動亂期間，容庚先生雖身處逆境，備受摧殘，仍不屈不撓地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晚年，容庚先生又將大批珍貴的文物和圖書資料捐獻給有關部門，表現了他崇高的愛國熱忱。

省市領導人林若、梁靈光、吳南生、楊康華、楊應彬、區夢覺、羅培元、張泊泉、羅範羣、左洪濤，學術界的知名人士黃友謀、蒲蛰龍、商承祚、王起、關山月、羅雄才、陳國楨、李沛文等參加了追悼會，獻了花圈，並對容庚先生的家屬表示親切的慰問。

容庚先生生前友好、中山大學師生以及各界群眾共百餘人參加了追悼會。嶺南大學校友會敬獻了花圈。

日本駐廣州領事館高僑迪總領事也參加了追悼會並送了花圈。

連日來，治喪委員會收到了海內外各界人士發來的唁電唁函八十餘封。各界知名人士周揚、李一氓、馮乃超、于省吾、王力、夏鼐、尹達、胡厚宣、徐中舒、鄭德坤、饒宗頤、啓功、張頴、沈之瑜等發來了唁電，對容庚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中華書局派代表專程來穗參加追悼會。香港《大公報》、香港《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和梁球璣、梁堯璣等也送來了花圈。中國書協廣東分會、廣州市青年書法協會、佛山市書法篆刻研究會等單位和個人送來了輓聯。

追悼會前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

赤誠愛國，嚴謹治學

歐 初

容庚同志與世長辭了。我們懷着深深的敬意悼念他，為我國失去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和書法篆刻家而惋惜。

容庚教授，字希白，號頌齋，廣東省東莞縣人。他從少年時期就喜愛收集、摹寫古文字，曾學習篆刻、繪畫。一九二一年任教於東莞中學。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著《金文編》，深受贊賞。一九二六年畢業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任講師、襄教授、教授，主講文字學課程，並任《燕京學報》主編及兼任過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受聘於廣西大學，但未及到職，即於一九四六年秋到嶺南大學任教授兼中文系教授。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我和容庚同志認識始於解放後，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容老的為人品格和治學風範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今他的音容不再見了，但他的人品、情操和治學精神將啟迪後來者。

容庚教授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前夕，他曾大聲疾呼，號召同行努力收集和保護文物，以免外流。抗戰初，他曾任燕京大學教職員工抗日委員會主席，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募捐，集資創辦宣傳刊物，支持和輔導廣東同鄉學生救國會，伸張民族正氣，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並親自撰寫文章，痛斥歷代對敵屈膝投降的姦臣，借以責罵國民黨賣國當局。抗戰勝利後，他因發表一篇「萬言書」，抨擊國民黨的政策，曾一度被解聘。解放後，在舊社會飽經憂患的容庚，看到新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日趨繁榮富強的道路，使他深受鼓舞，因而積極參加政治學習，在學術科研方面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五十年代初期，容庚曾多次函請久居香港的舅父鄧爾雅先生回廣州安度晚年。在鄧爾雅逝世後，他為之整理遺詩，編定《綠綺園詩集》，於一九六〇年在香港出版。容老在為詩集寫的跋文中，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對舅父生前「不獲見今日社會主義社會消滅貧

困，繁榮幸福，以詩鳴國家之盛，而僅以咏山水游觀之美，記朋友兒女之私，題草木鳥獸之畫以畢其一生，的遭遇感到惋惜。由此可見，容老對建國十一年後的國家巨變和取得的成就，贊頌之辭是溢於言表的。

一九五六年，容庚同志受組織委托，去香港工作，在香港期間，親朋和學者都力勸他留港或出洋，但他都婉言謝絕，毅然回到康樂園中，辛勤執教和研究。從香港回來後，他曾提出過入黨申請。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他在給香港和國外親戚的通信中，高度贊揚我黨的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並在物質條件較差的情況下仍然忘我地工作。「文革」開始時，橫加在陶鑄同志身上的罪名之一，是它在一九六二年一次知識分子座談會上，引用過容庚說過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句話。容庚教授對此非常氣憤，義正嚴詞地說：「這話是我說的，罪過在我，和陶先生沒有什麼關係！我看不出他有什麼錯處。」在後來的日子裡，他受衝擊，備受迫害，但依然剛直不阿。在「批孔」中，有人授意他批孔，但它不講違心之話，不作背理之事，不贊成對孔子採取完全否定的非歷史觀點，更堅決反對批孔聯系批「周公」的陰謀，表現了一位學者尊重科學、尊重歷史的崇高品德和對周恩來總理的誠摯愛戴。由於容老耿介直言，在「文革」中便成爲重點批鬥的一「活靶子」，成爲在十年浩劫中從未「解放」過的「老頑固」。他身處逆境，備受迫害，但依然一心放在專著上，不斷地修改和補充自己的論著，以期在有生餘年，繼續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在容老處境還比較困難的那段日子，我與他時有過從，每次見面，他總是高興地發表見解，言詞中充滿了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強信念，不因個人一時受些委屈而有所動搖。一九七五年，容老仍被困在一間很窄的房子裡，我將所藏清代金石家劉喜海的清稿本《秦陰簋金石碑目》，特請他題扉頁，容老欣然接受，立即書就，但却有意略去上款，說是不必爲此而引出麻煩。因爲那時他還時有受「批判」，可見他對同志何等之愛護。

容庚教授學識淵博，畢生爲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和發揚光大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對古銅器、古文字、書法篆刻的研究，都有很高的造詣，尤其對金文和青銅器的研究，在國內外居重要地位，素負盛譽。六十餘年來，他編撰了二十多部專著，發表了五十多篇學術論文，其中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等，均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推崇。「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容老在學

術上取得的成就，是經歷過長期艱苦磨煉掙扎的結果也是和他自少年時代養成數十年如一日的勤奮學習精神分不開的。他早年喪父，家境清貧，在家鄉東莞祇讀過中學。少時從其四舅父鄧爾雅學習古文字，並致力篆刻，輯錄《東莞印人傳》就是在此時成書。治印，在容庚的學術生涯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對他後來的學術成就就是有所影響的。他初治《說文解字》，是爲了寫篆刻印，青年時就曾經收集黃牧甫的印稿，在「頌齋」初期所藏金石書籍中，印譜占的比例不少。我曾聽他說過，對甲骨文發生興趣，也是和學習篆刻分不開的。成名之後，教學和研究之外，對印學從沒有放棄過，曾收集過鳥篆蟲書印文，本計劃編爲專集，可惜因其研究項目而不得不放棄，直到晚年，閒談中還常引以爲憾事。容老六十歲前，還常刻印，可惜無輯錄專冊，現存有實物的，除了自刻自用名印三方及爲其夫人所刻的一方外，祇見有給明義士刻的一方朱文，還有一方「啟功元白」，是四十多年前贈給啟功先生的。

容老善書法，又雅好收藏，早年曾編輯所藏名家書畫，影印爲《頌齋書畫錄》行世。其後所得歷代名跡益多，晚年重爲編纂《頌齋書畫錄》，並附所著藏書畫作者小傳，成《頌齋書畫小記》。每當我到他家探望，他都欣然喜色，談文講藝，拿出珍藏的書畫器物指點觀摩。容老在學術上的成就，與他在求知上的頑強意志和鍥而不舍的鑽研精神分不開的。他治學勤奮，自少至老，黎明即起，伏案讀書著述，十數小時不倦，正因爲有這種精神，纔使他從一個普通的中學生成爲一位學者。而在成名之後並沒有止步不前，治學更加嚴謹勤奮，一直到晚年猶勤於著錄。一九八二年春，容老因不慎跌倒而致坐骨骨折，傷勢較重。我多次到醫院探望他，交談中，知道他在病臥中仍不忘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的工作，盼望快些出院，修訂《商周彝器通考》，這種「一息尚存，不忘工作」的精神深爲可敬。

容老在學術上的成就，也是和他講究治學方法分不開的。他主張盡可能買齊有關專業的圖書，注意收集圖書目錄和題跋方面的著作。在「頌齋」藏書中，這類工具書應有盡有，拮据起資料如數家珍。容老藏書專業性強是其特點，從薄薄小冊子到大部頭專著，各依類從入藏，且多是經過精讀，其中有不少書籍還親自校點或批注，有些古籍親自補專寫書根，以至書籍次序井然，拮据快捷。容老讀書、寫作，不僅刻苦，而且嚴肅認真，從不放過一個不熟悉的單字或詞條，務必查考清楚而後止。正是由於有這樣的謹嚴學風，所以在他的大量著作中甚少有失誤處。容庚先生對所藏書畫等文物，總是希望發揮其更

大作用。他曾說過，數十年薪水收入，自奉甚微，所有餘資盡以購置書籍字畫器物，這樣做的目的，以供學術研究需用；二可以使國家文物減少外流。今老了，吾將獻於國家，以酬宿願。後來果然如言分批把銅器、字畫、書籍等捐獻給廣州市博物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這種爲社會主義祖國忘我獻身的崇高精神，值得欽佩。

容老在生活方面，向來清儉簡樸，飲食、穿著均不講究，時常穿的那套毛料中山裝，還是抗戰前做的。他非常注意鍛煉身體，喜用自行車代步，常向人介紹自己的體驗，騎自行車是鍛煉身體的好方法，一直到八十高齡，還騎車從珠江南岸過珠江北岸，後來在朋友規勸下，方始放棄騎自行車。

容庚同志離開我們了。他的品格和治學風範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我與容希白

商承祚

我與希白相識，屈指算來，已整整一個甲子了，為了慶祝他九十壽辰，《古文字研究》決定出版專輯，中華書局編輯部向我徵稿。我回憶起與希白初見訂交時的情景，還是那麼清晰，歷歷在目。

那是一九二二年的夏天，我在天津，有一天，羅振玉師告訴我：「你有位廣東同鄉，剛才來過，名叫容庚，字希白，東莞人，做過中學教師，他愛好銅器文字，編了一部《金文編》，是擴大吳清卿（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之作，很好；現住泰安棧。」我一聽，高興極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聯系上了，又是同鄉，志趣相若，不易得。於是馬上打電話到客棧和他聯系，然後去拜訪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諳北方話，我們傾談時同操粵語，真可謂他鄉遇故知，都非常的興奮。我們談家鄉的風物，談京津的見聞，談共同感興趣的甲骨文、金文，談古文字研究的計劃。初次見面，希白就給我留下了誠懇、直爽、勤奮、好學的深刻印象，堪稱良師益友。

希白北來，耳目一新，不慮南返，後經羅先生的介紹，進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固初創，只有他一人，勸我也入學，免得孤單，後來我也去了（但未畢業），我們又名副其實的同學。不久，希白任教燕京大學，我則就職於東南大學，繼而執教於中山大學，雖南北異地，但書札往來，未有間斷。一九二九年希白的《寶璽樓彝器圖錄》出版，我在廣州讀到後，發現其中有些器物的時代可疑，遂成《評寶璽樓彝器圖錄》一文，寄正希白。不久寄還，並附《答商承祚先生評寶璽樓彝器圖錄》，我復跋其後，一並刊於一九三零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百年紀念號》。粗看，我與希白一「評」一「答」，又是「跋」，反復論難，好象是「死對頭」，殊不知我們是知己摯友，情誼非同一般。

一九三零年秋，我回到北京，在師大、北大、清華任教，每次到清華授課，必於前夕下榻希白家，得以研討學問，或欣賞其所得的古器物，對該器真偽之見，時有分歧，乃至高聲辯論，各不相下。但我們學術上爭論歸爭論，朋友歸朋友，爭過就算數，絕不耿耿於懷，不因爭論而影響了友情。我知希白的

我與容希白

脾氣，性子急，「頂起牛」來，一項到底；因此，我一見他脾氣來時，就往往不吭聲，讓他三分，待他平靜後，再徐徐與之分辯。我們這樣的爭辯，「抬杠」，其家人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從不相勸。

我與希白經常討論的問題之一是器物真偽。希白於古文字研究造詣深，我不及他；而於辨偽鑑別則他不如我。我初購銅器，每受估人之欺，經過不斷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無切身之痛的。我謂偽，他謂真，各不相讓時有之，但希白事後却認真考慮研究，并不固執己見，此亦希白優點之所在。有一次，他正在鑑賞一物，上鐫四字，高興之極，見我去，興致勃勃地大談此物的妙處。我說，幾天前我已見過，因是器真字偽而未買。希白不信，又爭論起來，我舉證此四字是仿自某鐘的，於是當場查閱該器，證明確偽，他不能不服。過了半月，希白興奮地對我說：「我把那件假古董賣了。」我為之莞爾。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天津從讀羅師之時，希白由京來訪寓我家，每常談至深夜。一日，一覺醒來，發現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小印，章法布局勻稱，刀法古朴，實屬佳構。邊款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異常寶愛，帶着它到南京、屯溪、長沙、重慶、貴陽、成都，又帶着它回廣州。直至今日珍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見附圖）

在京聚首數年後，我又於一九三三年南下，任職於金陵大學。不幾年，抗戰爆發，輾轉西南，與希白天各一方，很難見面了。當我在西南見到希白主編的愛國宣傳品《火把》，讀到他鼓吹抗日，號召救國的文章時，欽佩之余，大大激發我抗日救國的熱忱。一九四六年希白到重慶，適我卸監務職，歸自貴陽，復得相見，我謂之曰：「學不進而刻印則工」，以數印示希白，歡聚數日而別。

重慶一別，希白經廣西回廣州，執教於嶺南大學，我亦於一九四八年回廣州，重返中山大學。全國解放後，經院系調整，我與希白又成了同事，且同住一樓，一上一下，不時見面，這樣不知不覺，一晃又是三十年過去了。

希白長我八歲，我以兄事之。我們結交垂六十年，不僅同鄉，而且同學、同行、同事，真是難得之極。為慶祝希白九十壽辰，爰寫此文，略述六十年來的情誼交往，以代壽言，並博希白一笑。



附圖

一九八三年春